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SKCB201703）



东亚

区域经济合作视角下的 危机阻隔机制研究

DONG YA
QUYU JINGJI HEZUO SHIJIAO XIA
DE WEIJI ZUGE JIZHI YANJIU

王红梅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SKCB201703）

东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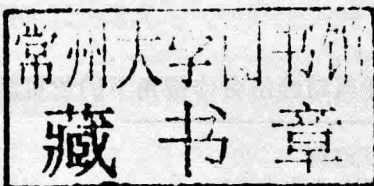
区域经济合作视角下的 危机阻隔机制研究

DONG YA

QYU JINGJI HEZUO SHIJIAO XIA

DE WEIJI ZUGE JIZHI YANJIU

王红梅◎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 平
责任校对:杜 彬
封面设计:璞信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视角下的危机阻隔机制研究 / 王红梅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690-1462-4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金融危机—研究—东亚
IV. ①F833. 10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5285 号

书名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视角下的危机阻隔机制研究

著 者	王红梅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462-4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8.75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目 录

0 导 论	(1)
0.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1)
0.2 研究对象的界定	(3)
0.3 文献综述与简要评价	(6)
0.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24)
0.5 结构安排	(25)
0.6 主要观点	(27)
0.7 创新点与不足	(31)
1 东亚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建设的理论基础	(34)
1.1 金融危机国际传导机制理论回顾及其对本书研究的意义	(34)
1.2 金融危机治理理论及其对本书研究的意义	(41)
1.3 小结	(42)
2 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模式”的实证检验	(44)
2.1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44)
2.2 亚洲金融危机在东亚的国际传导	(45)
2.3 小结	(54)
3 东亚危机防范机制建设路径一：适度调整东亚经济发展模式	(56)
3.1 适度调整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东亚经济的机体免疫力	(57)
3.2 小结	(69)
4 东亚危机防范机制建设路径二：坚持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71)
4.1 东亚经济一体化在危机防范层面的动因	(71)
4.2 东亚经济一体化对于危机防范的积极意义	(74)
4.3 东亚经济一体化对危机防范的负面效应及应对之策	(76)
4.4 小结	(83)

5	东亚危机阻隔机制的模型构想	(85)
5.1	东亚危机阻隔机制建设的指导思想	(85)
5.2	东亚危机阻隔机制的模型设计	(86)
5.3	东亚危机阻隔模型中的黏合剂：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	(96)
5.4	小结	(98)
6	美国次贷危机对东亚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的实证检验	(100)
6.1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100)
6.2	美国次贷危机对东亚的传导	(101)
6.3	美国次贷危机对东亚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的检验结果	(111)
6.4	小结	(119)
7	中国在东亚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建设中的战略选择	(120)
7.1	中国积极参与东亚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建设的战略意义	(120)
7.2	中国在东亚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建设中的战略选择	(122)
7.3	小结	(132)
	参考文献	(133)

0 导 论

0.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化,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地积聚和爆发。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即给东亚地区的经济以猛烈的打击,并波及拉美及欧洲。十年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了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而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经济区域当然也无法独善其身,东亚经济的持续增长态势遭遇寒流的袭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必然会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近十几年来国际金融危机体现出爆发频率高、危害程度深、波及面广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东亚经济不仅面临可喜的发展机遇,更得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在区域内传导的严重威胁。对东亚各经济体而言,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固然是重要的,但防范金融危机的产生和阻隔其在东亚区域内的传导也同样不可忽视。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矛和盾的关系。如果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策略比喻为矛,其代表的是积极进取地发展经济的态度和方式,那么树立危机防范意识,建立危机阻隔机制则可比喻为盾,其代表的是以经济发展持续性为目的的一种稳妥务实的发展理念和策略。矛与盾必须两相结合方能成就东亚区域经济的持续良性增长。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形成了东亚独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经济奇迹也证明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危机在东亚各经济体间的迅速传导,既暴露了东亚经济在长期增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也暴露了这种经济模式本身的制度性缺陷,即严重缺乏危机防范意识和危机防范机制建设。故笔者认为对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应该结合国际金融危机传导理论以及危机治理理论,高度关注东亚的危机防范与

阻隔机制建设问题。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东亚经济发展史上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均有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学术界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给予传统“东亚模式”的深刻反思而形成的丰硕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研究结论，从而使本书的写作受益匪浅。

但是同时，笔者却发现浩如烟海的文献著述中尚缺专文论述有关东亚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系统化建设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众多反思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论文中，大家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传导过程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暴露出的制度性缺陷给予了充分关注和深刻的研究，也对如何调整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各种建议。但是大家却没有把东亚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建设当作一个系统性工程来进行规划和设计，故东亚各经济体虽有强烈的抵御危机的意识，也进行了一些以防范危机为目的的合作（诸如危机预警、紧急救援之类），但遗憾的是这些合作是零散的，而不是一种系统性的机制建设。迄今为止，东亚那些非制度化、准制度化和制度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组织无一规划出东亚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的系统化建设蓝图，致使该机制建设显现出无规划、无主导、非系统、非制度化的弱点。而这些弱点必将造就东亚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的脆弱性，使该机制在金融危机真正来临之时，其抵御危机的功能和作用很可能大打折扣。

为此，笔者认为专文论述东亚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系统化建设问题对于加强东亚以防范危机为目的的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促进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升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一个系统的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建设构想对于东亚地区各国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达到这一目的，笔者在本书的研究中尽量归纳总结、提炼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努力为东亚的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建设探索路径并构思模型，虽然粗糙，唯愿抛砖引玉，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为东亚的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建设建言献策，使东亚的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更上一层楼。

故笔者认为本书的研究主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即追溯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在东亚的传导渠道，分析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危机传导效用，探索抵御危机的科学路径，为东亚危机防范与阻隔机制的系统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0.2 研究对象的界定

0.2.1 本书对东亚的界定

顾名思义,“东亚”(East Asia)即指亚洲东部,根据1979年版的《辞海》的解释,东亚包括中国、蒙古、朝鲜和日本。^①显然,这个范围的界定与目前学术界流行的“东亚”的界定相比差别太大,不足以体现一个可以与欧洲经济区、北美经济区形成鼎立之势的强劲的经济区域范畴。

事实上,“东亚”一词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研究领域使用频率颇高的字眼,是与东亚经济体40年奇迹般的崛起密不可分的。东亚经济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短短的40余年间,东亚区域经济以其持续的高速增长、非凡的出口业绩、日益增强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1993年,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应日本的要求对东亚一些主要国家及地区进行调研,随后发表了一份名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报告,界定东亚的范围包括所有的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泰国以东的中低收入国家,中国和泰国也包括在内。^②虽然该报告实际上仅研究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6个东亚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但世界银行这一界定却由于该报告的广泛流传而逐渐为大家所接受。

21世纪初,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部主任、东亚问题研究专家 Shahid Yusuf 以及世界银行两位经济学家 M. Anjum Altaf 和 Kaoru Nabeshima (2004)进一步完善了对东亚的界定。他们在《全球变革与东亚政策倡议》(Global Change and East Asian Policy Initiatives)中认为,东亚的范围应该包括东盟(ASEAN)、日本、韩国、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共计15个经济体。^③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东亚”的范围或概念的界定,仍然没有一个统一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462~463页。

②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③ Yusuf, Altaf & Nabeshima: “Global Change and East Asian Policy Initiatives”, the World Bank, 2004年,第68页。

的权威标准。不同学者往往根据自身的研究需要,从地理特征、国际关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不同角度对东亚进行不同的界定。但世界银行对东亚的界定已然得到了东亚问题研究者的广泛响应,使之逐渐成为主流。

本书中使用的“东亚”一词,遵循了世界银行的界定,即“东亚及太平洋地区”(the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这也是目前较为流行的对东亚的界定。

具体地说,本书结合了世界银行及上述有关专家对东亚的界定,将“东亚”区域界定为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十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 15 个经济体。

0.2.2 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界定

东亚经济属于区域性经济范畴,包括整个东亚地区的所有经济体,目前与欧洲经济、北美经济并称为世界三大区域经济体。但东亚经济区别于另两大区域经济的明显特征是,该地区拥有为数众多的经济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引进外部资金和先进技术,结合自身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带动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实现了工业化转型和经济赶超。经过了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东亚经济已经在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内部贸易份额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特征。

由于东亚国家与地区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在发展模式的具体层面上具有多种多样性的特征。国际上很多学者并没有用“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单一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多样化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

0.2.2.1 中外理论界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界定

自 20 世纪中叶开始,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便开始推动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从发达国家引进宏观经济调控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国或地区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社会条件和自然资源优势,通过独具特色和富有成效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打造出了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奇迹”。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理论界便开始了对“东亚模式”的研究。其中以克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秘诀在于采用了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制定

了现实主义的汇率制度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基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多元性的特征,采用复数形式的“East Asian Models”(即多样化的东亚模式)来替代单数形式的“East Asian Model”(即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例如有学者把“亚洲四小龙”视为“First tier ANIEs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cs)”,即“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而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称为“Second tier ANIEs”,即“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有学者将这一地区的经济体划分为“East Asian Tigers”(东亚虎)与“Southeast Asian Tigers”(东南亚虎),并对二者经济发展的异同进行了比较;还有不少学者使用了世界银行的提法,即“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经济实际优良的亚洲经济体)或“East Asian Economies”(东亚经济体);也有一些学者采用了“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提法。^①

0.2.2.2 本书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界定

尽管理论界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甄别莫衷一是,难于形成定论,但东亚国家共同的文化根底所形成的亚洲价值观、相似的后发国家地位,以及共同的赶超型的发展目标将它们紧密相连,其经济发展模式虽有个性差异,但东亚各经济体发展模式显现的共性特点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标志,因而本书提及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东亚各主要经济体的共有的发展方式和本质特征。本书使用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战后东亚各经济体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而在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管理手段和调控方式以及新儒家文化等方面高度融合的一种发展机制^②,即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中“共性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而非“多样化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本书探讨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指的就是东亚各主要经济体在发展模式中共同拥有的特质,笔者将之定义为“单一的共性的”东亚经济模式,期望有别于多样化的东亚模式。因此,在本书中,东亚模式的多样化特征将不在研究范围之内,相反,对东亚模式的共性特征与危机传导关系的研究将为本书研究的重点。

^① JOMO, K. S.: “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 (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 Malaysia and Indonesia)”, West View Press, 1997 年,第 27~30 页。

^② 田丰伦:《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研究》,重庆出版社,2005 年,第 35~36 页。

0.3 文献综述与简要评价

自 20 世纪至今,对东亚问题的研究文献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可谓是浩如烟海!而其中对东亚经济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主题多样且精细度高。由于本书的写作基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和东亚经济一体化两大主题,为了研究的需要,本章对这两大主题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基本观点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0.3.1 关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概述

0.3.1.1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从“东亚模式”这一概念提出以来,西方理论界对于“东亚模式”的态度就是褒贬不一的。例如以彼特·伯格为代表的“文化学派”认为,东亚地区盛行的传统儒家文化是促进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以安妮·克鲁格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主义学派却认为,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实施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此外,以罗伯特·韦德为代表的“制度学派”认为,东亚地区独特的国家制度和企业制度的结合是实现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三派的观点虽然各有分歧,但基本上对“东亚模式”还是持有肯定的态度,但是理论界对待“东亚模式”仍不乏否定和质疑的声音。当时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保罗·克鲁格曼于 1994 年在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题为《虚幻的亚洲经济》的文章,指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增加资源、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的,并没有实现生产效率的真正提高。而这种单纯以投入增加而非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无法持久的。而且随着投入总量的上升,如果无法实现科技进步、效率提高,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报酬递减”问题必将暴露,严重的话甚至会出现与苏联类似的经济停滞现象。因此在克鲁格曼看来,东亚经济的已有成就不但不是什么奇迹,甚至还是东亚危机的先兆,他基本上否定了所谓的“东亚模式”。^①

我国学术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也积极参与了这场关于东亚模式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到底是多样的

^① 保罗·克鲁格曼:《虚幻的亚洲经济》,《外交季刊》,1994 年夏季号,第 5~7 页。

还是单一的?东亚是否存在“经济奇迹”?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否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必然的联系?危机后东亚经济的发展前景与经济发展规律将有何变化?

顾江在《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看东亚金融危机》(1998)一文中对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与金融危机爆发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两者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东亚金融危机可能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一个开始。^①

汪斌(1998)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亚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在促使原有的“雁行模式”发生转换,并将于21世纪最终在东亚形成一种新产业发展模式——“双金字塔模式”。^②

赵春明(2000)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暴露了该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但是并不意味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从发展前景来看,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有益的调整将有助于东亚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恢复与再度快速发展。在调整过程中,不仅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增长质量以及内部需求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作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重要特征的国家干预职能也应得到重新调整和定位。^③

沈红芳(2005)就以实证的方法,比较了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并分类型比较“亚洲四小龙”、东亚三国以及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特点。作者明确提出东亚不存在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④

娄晓黎(2003)则试图从东亚和拉美的发展模式比较分析着手,寻找对政府干预最优化问题的正确答案。^⑤

傅新的《“新地区主义”: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要素》(2004)则提出: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体现了东亚各国主动推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变革,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均衡增长的变革意愿。^⑥

① 顾江:《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看东亚金融危机》,《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1期,第19~21页。

② 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和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亚太纵横》,1998年第7期,第1~5页。

③ 赵春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61~66页。

④ 沈红芳:《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⑤ 娄晓黎:《东亚、拉美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干预的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第50~53页。

⑥ 傅新:《“新地区主义”: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要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68~73页。

张宗斌(2006)提出:由于日本充当东亚经济发展领头者的“雁行模式”已经崩溃,因此,“日本在前面拉,中国在后面推”的东亚经济发展的“双头列车”模式也就失灵了。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构建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未来中国具备了引领东亚经济发展领头者的条件,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转移等方面是东亚经济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在东亚经济一体化方面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密切合作。因此,未来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在前面拉,而日本在后面推”。这种模式可称为“新双头列车”模式。^①

史龙祥在《从比较优势看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2006)一文中从静态与动态比较优势的角度揭示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变迁的动因,并从产业间与产业内比较优势的角度对“后雁行模式”形态进行分析,认为东亚地区将逐步形成网络型复合分工结构。^②

莫翔则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和反思》(2008)一文中驳斥了“东亚模式”危机论,他认为: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东亚主要发展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不完全排除东亚国家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起坏的作用,不过有充足的理由可以使人们肯定东亚发展模式中国政府的积极作用。^③

邵志勤(2009)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优势在此次金融风暴中有效抵御了一定的外部冲击。他对正在形成的东亚经济发展新模式进行分析,并对于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区域经济的构建以及目前面临的能源和通货膨胀等新挑战均提出了相关建议,并期望东亚经济体能够由此开拓出新的发展途径。^④

0.3.1.2 主要观点及评价

相关的论述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但大致包含了十年来学术界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研究主题上具代表意义的观点和研究视角,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本书的写作都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基于本书的研究需要,笔者总结了3个方面的研究结论,作为本书写作的有益参考。

① 张宗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与重构》,《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4期,第36~41页。

② 史龙祥:《从比较优势看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亚太经济》,2006年第1期,第13~16页。

③ 莫翔:《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和反思》,《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6页。

④ 邵志勤:《东亚经济复兴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2期,第87~91页。

1.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并非单一的，而是多样性的

作为一种区域性创新体系，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与地方和国家创新体系虽具有一致性，但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例如，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与日韩两国在金融体系上就表现为相当不同的体制类型。就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来说，深入的研究也已揭示出这种作用的方式、力度和范围等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研究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要研究其多样性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和概括。沈红芳（2005）按照东亚各经济体的发展特点划分出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见表 1-1。

表 1-1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分类

模式名称	国家/地区	基本特点
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新加坡、 韩国和 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香港地区	(1) 人均 GNP 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2) 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 GDP 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二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 (3) 对外贸易多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充裕。 (4) 良性循环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
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1) 人均 GNP 有很大提高，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呈良性互动关系。 (2) 农业部门在 GDP 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工业、资源型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等非传统制造得到较快发展。 (3)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外部不平衡，如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等。 (4)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	国内低投资率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 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 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人民生活贫困。

续表1-1

模式名称	国家/地区	基本特点
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越南	人均 GNP 增长速度很快, 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 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 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 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 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 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资料来源: 沈红芳:《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2005。

2. 多样性的东亚模式仍然具有共性特征

东亚国家与地区自 1840 年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后发工业化地位, 历史上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以及在对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追赶时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 所有这些问题都已成为东亚国家与地区在参与并改变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时所必须面对的共有的历史现实。该区域由于在文化和地理上的亲和性, 极大地方便了东亚国家与地区在技术、制度、政策和发展战略等多方面的相互模仿与学习过程, 从而在区域层级上突现出了创新体系的共同因素。

尽管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差异十分巨大, 但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中仍表现出了具有较强规律性的途径、手段和目标等内容, 根据抽象和综合的观点, 可以将构成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共性特点归结为以下三点。

(1) 政府主导的经济管理体制。

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内容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管理体制, 强大的政府作用是创造“东亚奇迹”的最大功臣。

由于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后发经济体, 市场失灵现象普遍存在, 而且市场缺位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因此各经济体纷纷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对国民经济实施引导和调控, 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这既是东亚各经济体在赶超型发展中的必然选择, 也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共性特征。

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 各经济体的政府作用根据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而各有不相同。概括起来大致有 4 类:

A. 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府作用。在经济发展初期, 这些国家或地区采取直接的行政干预手段, 对有经济增长潜力的行业进行直接干

预,助推其经济起飞。当这些国家或地区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便逐渐从直接转变为间接,经济调控手段也从有形转变为无形。

B. 中国香港地区的政府作用。中国香港地区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推行自由企业制度,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其政府作用体现于为经济运行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例如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出台各类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和高科技产业等。

C. 东盟三国的政府作用。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由于本国社会经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内部实权利益集团的抵制,东盟三国政府只能采取一种较为中性化的干预手段,大为迟滞了出口导向型的战略转变步伐。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随着欧美和亚太地区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先后放弃了最初拟定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战略,转而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开始实施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以菲律宾为例,以大地主为代表的当地政府与以美国垄断资本为代表的外来势力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局势,使菲律宾政府无法正常而有效地干预本国经济运行,所有的变革努力最后都会因境内外权贵们的抵制而摆脱不了失败的宿命。所以,东盟三国的政府作用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科学性、前瞻性,还是政策的连贯性各方面来看,均明显弱于“亚洲四小龙”。

D. 中国和越南的政府作用。中国和越南政府则在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中扮演了更为强势的主导性作用。两国政府都制定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并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强制实施与“自下而上”的诱导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东亚地区的政府之手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远远高于市场之手所起的作用。东亚各经济体或采用计划指导,或利用产业、财政、金融等政策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和管理,充分体现了强政府作用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基本特征属性。

(2) 高储蓄与高投资相结合的经济增长模式。

以低工资为核心的低成本优势,造就了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高储蓄与高投资相结合的特征。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投资增长是储蓄增长的必然结果,而储蓄增加是投资增加的必要条件,投资和储蓄相互依赖和促进。一方面,东亚各经济体行政主管部门采用各种措施来提高本国或地区的储蓄率;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高储蓄导致了较高的积累率,最终促成了高投资的实现。东亚各经济体就是按照这种高储蓄与高投资相结合的具有区域经济特色的增长模式来运行的,这是东亚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也是东亚经济发展

模式的基本特征。

(3) 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

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的主导下采取了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其中根据具体的发展策略和措施分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出口贸易为“引擎”的外贸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另一种是以引进外资进而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外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

A. 外贸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

近30年来,即便是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时期,东亚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均保持了绝对领先的地位,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亚的外贸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按照钱纳里“两缺口模型”的观点,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中存在着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在没有外资流入的情况下,两缺口中的较大者便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实行外贸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只要提高和维持一定的储蓄率和出口能力,便能促进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例如东亚经济的典型代表日本便是实施外贸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的成功范例。

B. 外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

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在内外条件上与日本具有较大差距,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除了采用外贸主导型战略以外,基本上还都采取了以引进外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战略,其中尤以东盟各国为典型代表。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70—80年代引进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随后又进一步开放了资本市场,使得引进外资的渠道更加趋于多元化,引进外资的规模也得以进一步扩大。

在东亚的外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中,外资进入包含了境内商品的出口换汇和境外资本的直接引进两个方面。其中,从境外进口零部件,然后在境内完成组装,最终将制成品出口到境外来创造外汇收入。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种外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中,外资进入有相当部分来自加工贸易商品出口的扩大,而这又必须以原材料零部件等进口的增长为代价。而直接引进外商投资的重点也在于以外资的引入来带动外贸的发展,以大量投入的境外资本来满足境内旺盛的投资需求,并带动新的自主投资能力的活跃,以及境内中间产品制造业的蓬勃发展。

不过,在外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中存在着两个潜在的风险:其一是经常项目风险。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进口大量的用于加工或组装的机器设备和大量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使得经常项目可能因此而出现持续的逆差。其二是资本项目风险。不论何种形式的境外资金的流入都潜藏着未来境内